

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信息贫富分化研究^{*}

周文杰 闫 慧 韩圣龙

摘 要 本文以“信息源视野”理论为研究视角,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信息源与信息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作为信息贫富状况的表现,信息主体的“信息源视野”宽广程度不仅受制于周边物理信息源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②在信息主体的“信息源视野”中,组织化信息源的缺失加剧了信息贫困;③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人群在“信息源视野”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职业类型与“信息源视野”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表 2。参考文献 27。

关键词 信息贫富分化 信息源视野理论 信息源偏好

分类号 G250

Exploring Information Divide Based o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Zhou Wenjie, Yan Hui & Han Shenglong

ABSTRACT

This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information divide based o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proposed by Reijo Savolainen. Through a field study, we explored how the su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and so on and objective factors like organized information source etc. could affect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or poorness of people.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formation richness or poorness among various people, we also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broadness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divided by demographic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cluding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and fifty rural residents were interviewed in five focus groups and fifty-two residents were cover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t meantime of interview, 387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202 valid questionnaires could be use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nformation rich are not only utilizing the socially designed information space adequately, but also bringing their subjective dynamics into information practice initiatively. Therefore, the so-called “the information rich” broaden their constructed information space and formed wide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Finally, they are on the advantaged side of information divide. In reverse, the information poor have a narrow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and limited information source. They tend to perform passive information acquiring actions. Thus, thes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nto the disadvantaged side of information divide. Secondly,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organized information sources, those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get access to these typ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wn a relatively high possibility to fall into information poor situations. Thirdly, a complex relationship is built between the broadness of information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信息贫富分化现状及政策启示研究”(编号:14XJA870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化贫困与公共数字文化政策的评估与反思”(编号:NKZXB1449)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信作者:周文杰,Email:wj_lp@sina.com

source horizon and demographics of the sample as follows: the broadness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does not has gender differences; age span may affect information richness through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educational level affects the broadness of information horizon potentially;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cation types and the broadness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for that many soci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re embedded in voc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at the quantitative data is not extracted from a random sample, thus, the findings are limited to describe th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instead of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and a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we didn't cover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importance across various information sources within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horizon of people on information divide. Many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logics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vism are still under debate, and therefore this dilemma may affect the validity.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study tries to interpret the information divide through a new theoretical view. Second, we provide the new evidence for the information divide phenomena through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Third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mply new ideas for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poverty.

We made cre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theory and information divide phenomena. Thus, we contributed a new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 for information divide. 2 tabs. 27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divide.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 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0 引言

在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信息贫富分化问题引起多个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很多研究者试图从信息源的角度解析信息分化现象,然而,站在不同立场上的研究者常常对信息贫富分化与信息源之间的关系做出不同解读。有研究者发现,社会和文化标准规制了特定人群的信息行为,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小世界”^[1],处于“小世界”中的人群因与外部信息源之间的疏离而造成了信息贫困^[2]。以数字鸿沟名义展开的研究认为,是否接入因特网是判断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重要标准^[3-4]。另有研究者试图以社会资本解释信息贫富分化现象,认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如结构洞)和网络属性(如信息交流网络的大小)直接导致信息贫富分化^[5]。

虽然大量研究都证实了信息源与信息贫富分化之间的关联,但最近几年的研究也发现,即使处于相似的信息环境,人们的信息状况仍然存在着贫富分化现象,信息贫富分化不能仅仅通过社会结构的因素来解释^[6]。换言之,现有

研究尽管证实了人们周边信息源的多寡、优劣会影响信息贫富状况,但较少有研究者透过信息主体的视野,综合考察各种与信息源选择相关的主客观因素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影响。

显然,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全面理解不仅需要考察物理信息源多寡、优劣等客观因素,也需要兼顾个体对信息源的选择偏好等主观因素。本研究以 Savolainen 提出的“信息源视野”(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理论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探查信息源的选择偏好等主观因素及组织化信息源等客观因素之于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并对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人群的“信息源视野”进行分析,以便了解不同人群在信息贫富状况方面的差异。

1 理论背景

“信息源视野”理论是 Savolainen 于 2007 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旨在分析人们在信息活动中选择信息源的范围及偏好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社会学家 Schutz 在 1964 年提出的“相关区域”理论和情报学家 Sonnenwald 等于 1999—2001 年间提出的“信息视野”(information horizon)理论

与方法为基础。Schutz 认为,人们知识的结构化是通过其日常生活与周边区域的关联来实现的。依照相关程度可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区域区分为如下几种:①触手可及的区域,指人们日常行为发生的区域,属最相关的区域;②潜在可及的区域,指当人们有需要时,其行为可扩展到的区域,属第二位的相关区域;③相对无关区域,指与人们的直接兴趣暂时无关的区域;④绝对无关区域^[7-8]。为了考察个体信息来源的广泛程度,Sonnenwald 等设计了“信息视野”方法,通过让个体提名他们的信息源,并依据这些信息源离其自身的远近绘制“信息视野地图”,据此对个体信息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9-10]。Savolainen 认为, Schutz 所述的知识结构化与其日常生活区域之间的关联是基于个体的即时兴趣,具体体现在个体对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的偏好上^[11]。“信息源视野”理论正是基于 Schutz 的理论,并借鉴 Sonnenwald 的方法而提出的。

“信息源视野”理论认为, Schutz 所划分的区域经过“信息源偏好标准”(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criteria)过滤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信息源:最重要信息源、次重要信息源和边际信息源。信息源偏好标准包括:信息的可获性(availability)和可及性(accessibility),信息内容(如质量),信息的可用性(如有清晰组织的信息),用户特征(如媒体选择习惯)和情境因素(如缺乏时间)^[11]。基于经验研究,Savolainen 发现,为满足当下的兴趣,个体对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进行结构化,使其信息行为的相关区域不断扩大,这种结构化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重要程度的评估。在搜寻满足最主要兴趣的信息中,个体最主动;反之,当搜寻的信息只满足边缘兴趣时,个体则比较被动。通过经验研究,Savolainen 发现,信息源偏好对信息源的选择产生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选择最熟悉、最容易获取的信息源^[11-12]。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访谈既包括焦点小组访谈,也包括个别深度访谈。

2.1 焦点小组访谈

本研究中,焦点小组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接触受访者,对访谈问题的适应性进行考察,以便从面上获取更大范围的数据。在具体研究中,参照信息行为与信息贫富分化领域现有理论研究成果拟定访谈提纲,并于 2012 年 1 月在甘肃省的 4 个村庄和 1 所中学组织了 5 次焦点小组访谈,受访人数达 50 人。焦点小组访谈主要围绕信息获取的渠道、信息源、信息获取优先性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每次焦点小组访谈都邀请当地较有声望的人士(如当地学校的校长等)出席并介绍访谈者,并把焦点小组访谈安排在一个访谈者与受访者“团团围坐”的会场,使现场交流的气氛自然、亲切。

2.2 深度访谈

本研究中,个别访谈重在深度介入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世界,以便从点上更全面深刻地把握每位受访者的信息源偏好。个别访谈采用了入户访问的形式,笔者在当地学校教师或志愿者的带领下,就近进入受访者家中进行采访。本研究在焦点小组访谈的基础上,参照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调整和深化了访谈问题,形成了个别访谈提纲,并对 52 名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焦点小组和个别访谈过程中,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全部访谈进行了录音,共获得了约 1 560 分钟的访谈录音资料。还对部分有代表性的访谈摄制了录像资料,共获得了约 400 分钟的视频影像资料。访谈结束后,笔者对录音和录像资料进行了整理,将其转换为文字稿,以备分析。

2.3 问卷调研

本研究参照“信息源视野地图”的方法^[9-10],请受访者提名其信息源。为防止受访者在实测中遗忘重要的信息源,笔者对前

人^[12-13]关于信息行为、数字鸿沟等相关领域研究中所提取的信息源进行了汇总整理,并列出这些信息源供受访者参照。问卷调研的对象首先是本研究焦点小组和个别访谈的受访者。为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研究者在周边区域补充发放了问卷,共发放问卷 387 份,收回 272 份,剔除未通过“测谎”的问卷后,实际用于定量分析的问卷 202 份。

3 研究结果

3.1 受访者“信息源视野”宽广程度的差异

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将个体的信息贫富状况归因于其所处的物理空间中信息源的多寡、优劣。但最近数年来,也有研究者提出,如果考虑个体在信息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则信息获取的空间不仅指信息源分布的物理空间,也指信息搜寻者对信息源有用性的感知^[10]。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分析不能忽视人们对信息源的主观选择。Savolainen 在对大量的关于信息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人们信息行为发生的空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①信息源分布的物理空间;②信息搜寻者与信息源之间的物理距离;③信息搜寻者的信息视野^[14]。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还是信息主体主观感受到的空间,都与人们信息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当人们认为某信息源对其具有很高的价值时,很可能会克服物理距离上的障碍而获取该信息源;反之,即使对于近在咫尺的信息源,如果人们没有信息需求或没感知到信息获取的价值,则很可能“无视”其存在。据此,于良芝指出,个体信息实践的空间有两种形式: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和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是一种专门以信息提供为目的而设计的信息空间,这种场所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信息服务,满足个人的信息需求。除此之外,个体也会把一些原本并非以信息提供为目的的空间“建构”为个人的信息空间,从而形成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15]。

在本研究进行的访谈中,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在个人信息世界中的作用得到了明显体现。例如在一次有 10 名受访者参加的焦点小组访谈中,笔者获得了如下资料。

访谈者: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有急需获得某种信息的情况(如为子女上学了解关于报考学校的信息,或您外出打工需要了解招聘信息)?您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了这些信息?

受访者 W1(男,初中文化,半农半牧兼作中药材生意):我常常急需了解中药材价格方面的信息。为了了解这些信息,以前经常去学校问老师或请老师们帮我上网查询。后来我也买了电脑,自己在网上查询。

受访者 M(男,初中文化,卖大饼):我孩子马上要升学了,我需要了解关于学校的信息,为此我常常到学校去咨询老师。

受访者 W2(男,高中文化,蔬菜大棚种植户):在我的大棚种植中,有时候会需要了解一些农业病虫害方面的信息,所以我常常去学校咨询老师,因为他们能上网,可以帮我查询。另外,我也会打电话给镇农科站,那里的技术人员也会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

由于本研究依托一个非政府组织(青树基金会)的信息服务项目而开展,该基金会已经在本研究实施的区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村民信息技术免费培训活动,其目的是提高当地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而培训基地正是当地的学校。该基金会资助当地学校装配电脑等 ICT 设备的唯一条件是,这些设备必须能够免费提供给当地居民使用。因此,本研究所涉及地区的学校已被建设成了一个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由上述访谈资料不难看出,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已经被当地很多居民作为一个重要信息源纳入了其“信息源视野”。显然,对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利用越充分,个体的信息获取越有保障,因而在信息贫富分化中便处于优势位置。这种优势恰恰体现了信息源的物理存在与人们信息贫富分化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与现有的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等方面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个体通过主观建构,将更多的信息源纳入其信息源视野,从而实现信息的富裕化,这一现象在本研究中也得以体现。访谈中,笔者发现,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大小不同,信息行为者的信息丰富程度也明显不同。例如:

受访者 Z1(男,高中文化,出租车司机):干我们这行,总有些人消息比较灵通。比方说家住在城里的人,他们也不一定经常上网去查或者打电话给顾客,因为他们在商店、饭店、车站都有认识的人,所以客源信息就广。

由这位受访者的陈述不难看出,在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活动中,不同的个体建构了不同的信息空间,从而使其“信息源视野”的宽窄程度出现了差异。在此例中,与家住农村的司机相比,城市的司机把“商店、饭店、车站”都建构为信息获取的空间。显然,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越大,则其可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下例更是一个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使其扩充“信息源视野”的典型例证:

访谈者:您说您只上过初中,可我觉得您知识面很广,似乎不止初中文化程度。

受访者 L(男,初中,正在申请一个农业专业种植项目):是吗?可能是因为我常年外出打工,认识了很多外地人,这些人从事各种工作,我的多数想法都是在跟他们交流中得来的。我也不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要去请教他们,而且问他们也不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回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打工的。但是我还是喜欢经常与这些外地人交流,因为我能受到很多启发。打工攒点钱时,我就去看博览会,结果在那里发现了我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项目。

此例中,笔者明显感觉到受访者表现出了高于其教育水平的知识储备和信息量。该受访者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从具有“异质性”知识结构的“外地人”处获得大量信息,并据此完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获得了想法”)。在访谈中,该受访者向笔者展示了他用以申报农业环境保护项目的立项申请书,这一文本从语言组织到项目论证都具有一

定的专业水准。显然,就这位受访者而言,其建构的信息空间是如此宽广,以至于其信息行为能力远远超出了其教育水平。与此相反,有些受访者信息渠道单一,信息搜寻行为消极被动,从而表现出狭小的“信息源视野”。如下例:

访谈者:您销售蔬菜的信息通常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

受访者 Z2(女,小学,蔬菜种植户):生产信息主要凭自己的感觉,自己没有去市场了解过,也没有主动与菜贩子进行过联络。如果菜贩子不上门收购或者收购价格低,就常常会亏损。蔬菜利润太低,明年打算不再种蔬菜大棚了。

笔者发现,尽管这位受访者所从事的蔬菜种植与销售需要大量信息的支持,但囿于狭小的“信息源视野”,这位受访者不仅没能有效地获得这些信息,反而选择了更加消极的应对策略——放弃蔬菜种植。概括而言,这位受访者的信息贫困具体表现在:首先,她从未使用过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以解决其生产中的问题;其次,受访者建构的信息空间仅限于其个人经验。由此可见,导致个体信息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周边缺乏优质信息源,也在于缺乏将丰富的信息源纳入“信息源视野”的能力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源的物理存在构成了人们“信息源视野”丰富化的物质前提,而人们的建构能力与意识则是实现其“信息源视野”丰富化的关键途径。简言之,信息源的物理存在与个体的建构能力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人们的“信息源视野”,并最终影响了其信息贫富状况。

综上所述,从个体信息活动的空间来看,一部分个体不仅充分利用了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而且在信息实践中也不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扩充“建构的信息空间”,形成了宽广的“信息源视野”,从而在信息贫富分化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反过来,信息源视野狭小的个体则信息来源单一,信息行为被动,在信息贫富分化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3.2 组织化信息源与“信息源视野”

Savolainen 通过对研究对象所提名的信息源

进行归类,最终划分出 6 类信息源:人(如朋友)、广播媒体(如收音机和电视)、印刷媒体(如报刊杂志)、网络媒体(如电子邮件)、组织化资源(如公共图书馆)和其他^[11]。本研究在获得受访者对其日常惯用信息源的提名后,邀请了 10 名情报学领域的专家根据信息富集程度和质量对每种信息源赋予了分值。专家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各种信息源中,组织化的信息源是最优质的信息源之一。由于人们对优质信息源的使用是实现其信息富裕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组织化信息源的使用程度与人们的信息贫富状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表 1 显示了本研究中受访者所选定的前 10 位的信息源。其中熟人、朋友、同事、家人等可

归入“人”这一类信息源,电视是“广播媒体”类信息源,报纸、书籍等属于“印刷媒体”类信息源,在家或在单位上网属“网络媒体”信息源。与 Saovlainen 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中没有任何组织化资源(如公共图书馆)进入受访者提名信息源的前 10 位。由于本研究所调研的区域位于中国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公共文化条件相对落后。尤其是主要访谈区域属偏远农村地区,在村民日常生活可及的范围内并无公共图书馆及相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这使得组织化资源处于缺失的状态。即使在城区,公共文化机构还远远没有实现“全覆盖”。这种基础设施不完备的现状导致组织化资源无法成为受访者的重要信息源。

表 1 受访者选定的前 10 位信息源

排名	信息源	选择数	选择比例(%)	排名	信息源	选择数	选择比例(%)
1	电视	102	50.50	6	朋友	79	39.11
2	报纸	100	49.50	7	在单位上网	75	37.13
3	在家上网	92	45.54	8	手机	68	33.66
4	书籍	88	43.56	9	同事	64	31.68
5	熟人	79	39.11	10	家人	58	28.71

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角度看,组织化信息源缺失的后果之一是,人们无法意识到从公共图书馆等优质信息资源体系中有效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从而更有可能在信息社会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例如,前文提及的受访者 L 在申请一项农业环保型种植项目,这个项目显然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从本研究的访谈来看,这位受访者尽管使用了多种信息源,但从未使用过组织化信息源。把这位受访者申请项目的行为与专业研究人员科研立项的行为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专业研究者对科研项目的立项中,首先需要大量借助组织化信息源,然后依据这一资源体系所提供的信息,论证和推进自己的研究项目,而受访者 L 却明显缺失这一环节。可见,受访者 L 尽管在与其具有同质性的人群(农民)中处于信息相对富裕的地位,但与专

业研究人员相比,组织化信息源的缺失仍然使其处于信息相对贫困的状况。

总之,由于组织化信息源在信息提供与信息服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当人们的“信息源视野”中缺失了这一优质信息源时,信息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更高。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组织化信息源本身作为优质信息源的物理存在方面,更重要的体现是,组织化信息源已经附加了一定的认知建构的努力(如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整序),因此可能使用户以更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更大的信息收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信息源视野”中组织化信息源的缺失,使得在某个群体(如农民)中信息相对“富裕”的个体(如受访者 L),与其他人群(如专业研究者)相比,仍处于信息相对贫困的境地。

3.3 受访者的社会学特征与其“信息源视野”的关联分析

在现有的信息贫富分化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都把社会学特征作为测度信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以数字鸿沟的研究为例,现有研究者认为,性别和年龄^[16]、职业^[17-18]、收入^[19]、教育水平^[20]等因素是造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沿用“信息源视野”研究中对信息源及偏好进行提名的方法,从信息源偏好的角度

对受访者信息源视野的大小进行测度。如本文3.2所述,本研究根据专家判断,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富集程度和质量赋予分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加权,使受访者提名的“信息源视野”变成了一个连续型变量。本研究以这一变量为因变量,针对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受访者,对其在“信息源视野”变量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见表2)。

表 2 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的受访者信息源选择的相关系数矩阵

性别		女	男	年龄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以上
	女	1	0. 892 **		20—29 岁	1	0. 611 **	0. 491 **	0. 322 *
					30—39 岁	0. 611 **	1	0. 905 **	0. 594 **
					40—49 岁	0. 491 **	0. 905 **	1	0. 627 **
	男	0. 892 **	1		50 岁以上	0. 322 *	0. 594 **	0. 627 **	1
收入水平			0. 9 万元以下	1—1. 9 万元	2—2. 9 万元	3—3. 9 万元	4—4. 9 万元	5 万元以上	
	0. 9 万元以下		1	0. 829 **	0. 591 **	0. 638 **	0. 577 **	0. 629 **	
	1—1. 9 万元		0. 829 **	1	0. 498 **	0. 531 **	0. 479 **	0. 440 *	
	2—2. 9 万元		0. 591 **	0. 498 **	1	0. 814 **	0. 734 **	0. 662 **	
	3—3. 9 万元		0. 638 **	0. 531 **	0. 814 **	1	0. 748 **	0. 771 **	
	4—4. 9 万元		0. 577 **	0. 479 **	0. 734 **	0. 748 **	1	0. 795 **	
	5 万元以上		0. 629 **	0. 440 *	0. 662 **	0. 771 **	0. 795 **	1	
教育水平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小学		1	0. 715 **	0. 464 **		0. 327 *	0. 345 *	
	初中		0. 715 **	1	0. 684 **		0. 630 **	0. 570 **	
	高中/中专		0. 464 **	0. 684 **	1		0. 900 **	0. 755 **	
	大专		0. 327 *	0. 630 **	0. 900 **		1	0. 812 **	
	本科及以上		0. 345 *	0. 570 **	0. 755 **		0. 812 **	1	
职业			农民	教师	工人	公务员	个体户	公司职员	
	农民		1	0. 518 **	0. 351 *	0. 403 *	0. 650 **	0. 286	
	教师		0. 518 **	1	0. 365 *	0. 584 **	0. 425 **	0. 420 **	
	工人		0. 351 *	0. 365 *	1	0. 589 **	0. 594 **	0. 635 **	
	公务员		0. 403 *	0. 584 **	0. 589 **	1	0. 779 **	0. 840 **	
	个体户		0. 650 **	0. 425 **	0. 594 **	0. 779 **	1	0. 770 **	
	公司职员		0. 286	0. 420 **	0. 635 **	0. 840 **	0. 770 **	1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1)不同性别的个体在信息源视野宽窄程度上所得分数的相关系数达 0.892($r=0.892$),在 0.01 水平下显著相关($p<0.01$)。由此可见,就整体样本人群而言,无论是男性受访者还是女性受访者,其“信息源视野”宽窄程度相似度很高,即从整体上说,“信息源视野”的大小并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据此,本研究认为,性别并非造成“信息源视野”差异的关键因素。如果以信息源选择偏好的差异来衡量个体在信息贫富分化层级中的位置,则性别因素与信息贫富分化的关联程度不高。

(2)不同年龄段的个体“信息源视野”具有程度不同的相关性。其中 50 岁以下的 3 个年龄组之间相关系数值较大($r>0.49$),显著性水平也很高($p<0.01$);而 20—29 岁组与 50 岁以上组相关系数($r=0.322$)和显著程度($p<0.05$)有所降低。据此认为,相仿年龄段人群的“信息源视野”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随着年龄差距的加大,这种相似程度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年龄跨度很可能会通过影响“信息源视野”而对信息贫富分化产生影响,但就本研究所获的数据而言,尚不足以深入揭示年龄跨度与信息贫富分化之间的精确关系。

(3)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对信息源的选择具有相关性,这表明不同收入人群的“信息源视野”具有相似性。然而,数字鸿沟领域现有大量研究成果都发现了收入水平与数字鸿沟存在关联。本研究认为,收入水平是通过影响信息获取条件而对信息贫富分化产生影响的。但从“信息源视野”的角度看,不同收入的人群在信息源的选择偏好、兴趣等主观因素方面并不一定具有明显差异,从而在选择将周边信息源纳入“信息源视野”方面更多地表现为相似性。换言之,收入高者虽然更有可能生活在一个优质信息源富集的环境中,但若其“信息源视野”狭小,则很可能使其对周边的优质信息源“视而不见”,从而沦于信息贫困。可见,高收入水平虽然为个体信息富裕化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的前提是,个体必须具备相应的主

观建构能力,以便将周边信息源纳入其“信息源视野”之中。

(4)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体对信息源选择具有相关性但相关程度略有不同,这表明教育水平是影响人们“信息源视野”的一个潜在因素。本研究的数据表明,小学组与初中组和高中(中专)组人群“信息源视野”的相似程度高于小学组与大专和本科以上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水平的差距越大,“信息源视野”的相似性越小。而“信息源视野”的差异进而会导致信息贫富分化的发生。

(5)职业与“信息源视野”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关系。由表 2 可以看出,部分职业的从业者对信息源的选择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如公务员和公司职员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0.84,在 0.01 水平下显著相关),但也有些职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如公司职员和农民相关系数为 0.286,在 0.05 水平下无显著相关)。本研究认为,这种复杂关系表明,把职业作为衡量信息贫富分化的变量常常是有风险的,因为职业本身已经复合了多种社会 and 个体因素。所以,单纯通过职业因素解释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其结论往往是令人质疑的。

4 讨论

4.1 信息贫富分化研究理论视角的转向

以数字鸿沟等名义展开的研究已充分地揭示了人们所处环境中信息源(如因特网)的物理分布对于其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本研究中所获得的证据同样支持了现有结论。如本研究发现,组织化信息源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加剧了信息贫困。然而,深入考察信息贫富分化现象还需要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信息源是否以及如何被信息主体纳入其信息视野。依照“信息源视野”理论,信息源只有在被信息主体纳入“信息源视野”时,才能对其信息行为产生实质影响,而信息源能否被纳入“信息源视野”,则常常取决于信息主体的个人兴趣及其在

特定情境下对信息源可用性、质量等因素的判断。由此可见,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剖析不能仅仅止步于对信息主体所处的客观信息环境的分析,而需要充分关注人们在信息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寻求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做出更全面的理论解释。

事实上,“结构与主体能动性的对立”是“社会科学理论中根深蒂固的理论断层之一,其存在不可避免地阻碍我们对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解”,据此,于良芝等呼吁,关于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如何相互影响,以及二者如何共同决定信息不平等和信息贫困现象,仍然是信息分化研究领域的空白,本领域的研究者应积极寻找理论转向,以填补这一空白^[21]。本研究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展开的考察所获取的证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基于整体性理论视角解析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4.2 建构主义语境下的“信息源视野”

最近数十年来,建构主义学说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信息行为研究领域,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是一个具有浓厚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框架。意义建构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Brenda Dervin及其同事发展的传播学理论。意义建构理论认为,只有将外部信息置于个人的特定情境中,并且用于个人的意义建构时,外部信息才有价值,信息的效用只有信息用户在自身的情境下解决自己的问题时才能彰显出来。信息交流的过程,发生在信息用户自身的情境中,受到个人自身的知识、经验、判断、情感、生理、心理、时间、空间等限制^[22]。意义建构理论关注信息获取和利

用的建构过程,关注影响建构过程的因素。当建构不能顺利完成时,信息贫困的现象就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建构理论为研究信息贫困和信息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建构主义的视角^[23]。

Savolainen在提出“信息源视野”理论时,虽然没有明确地阐释意义建构理论与“信息源视

野”之间的关联,但在关于“信息源偏好标准”的论述中,事实上分享了与意义建构理论相似的视角。本研究所获取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意义建构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主体的“信息源视野”而对其信息贫富状况产生影响。例如,农科站作为提供农业信息的一个重要信息源,对于遭遇过病虫害问题的蔬菜种植户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这些农民把农科站纳入了其“信息源视野”。然而,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把农科站排除在“信息源视野”之外(根本没有与农科站发生过联系),其原因显然不在于这一信息源的物理存在,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这些农民的个人经历、知识水平及所从事产业的局限,使其对农科站提供的信息缺乏兴趣,导致将农科站判定为无价值的信息源,并最终将其排除于“信息源视野”之外。可见,意义建构至少有可能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农民的“信息源视野”的大小,从而对其信息贫富状态产生影响。首先,农民通过将周边信息源建构为“有价值信息源”或“无价值信息源”,从而实现对周边信息源的“过滤”。其次,能否从纳入“信息源视野”的信息源中汲取有效信息,以弥补信息“断点”(gap),会对农民是否能顺利完成意义建构过程产生影响,而意义建构过程完成与否,又影响了农民的信息贫富状况。

4.3 植根于情境的“信息源视野”

最近数年来,信息行为的研究者对于情境因素给予了关注。有研究者指出,情境意味着信息现象的任何背景^[24-25]。也有研究者认为,情境虽然不是信息现象的内在组成部分,但信息现象仍然与之紧密关联,没有了情境,信息现象就失去了意义^[26]。Chang和Lee在针对8名台湾地区居民的研究中发现,在信息行为和情境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联结(association)、互动(interaction)和定向(directional)^[27]。联结是指特定信息行为在某一情形下的共现;互动是指情境首先影响信息行为,然后这种行为反过来

又转变为情境因素；定向关系则指情境鼓励、影响、决定或预防一些信息行为的发生。Kari 和 Savolainen 进而把上述关系分解为联结、孤立、关注、归因等 11 种类型^[26]。

本研究获得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受访者“信息源视野”因植根于情境而具有的一些特征。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基于情境因素的“信息源视野”具有如下特征。①稳定性与恒常性。即，由于信息行为与情境之间“联结”关系的存在，会使人们在特定情形下有相似的信息行为。例如，由于将农科站纳入了“信息源视野”，蔬菜种植户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遇到生产方面的问题，都会积极谋求来自这一信息源的信息支持。由于“联结”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因此，植根于情境的“信息源视野”具有了稳定和恒常的特征。②选择性与偶发性。如前所述，只有被信息主体建构为“有价值”的那些信息源，才有机会进入其“信息源视野”，反之，即使在物理上存在于信息主体周边的信息源，也很可能无法进入其“信息源视野”。由此可见，“信息源视野”具有选择性。本研究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正是信息行为和情境之间“互动”、“定向”关系的具体反映。即，在特定情境下，如果用户获取信息的努力得到了来自信息源的积极反馈（互动），则会鼓励信息主体将其纳入“信息源视野”的行为（定向）。然而，人们在获取某种信息之前，事实上并不清楚哪个信息源能够提供有效信息。因此，从某个信息源获得信息并将其纳入“信息源视野”，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偶遇”的特征。例如，某个农民在得到某条打工信息前，并不知道从哪里可能获得这些信息，但当他（她）偶尔从报纸的副刊中看到一则招工信息，并成功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时，报纸就很可能被其纳入“信息源视野”。

总之，正是信息行为与情境之间联结、互动与定向等多种关系的存在，使信息主体的“信息源视野”具有了上述特征。洞察“信息源视野”的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人们的信息行为，也为深入解析信息贫富分化发生的内在机理提供了

有益的视角。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信息主体“信息源视野”宽广程度不仅受制于周边物理信息源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建构的信息空间。对于生活在具有同质性的客观信息环境的人群而言，个体的建构能力限制了其“信息源视野”的大小，从而对信息贫富状况产生了影响。

其次，组织化信息源的缺失，使信息主体的“信息源视野”中缺少经过专业化整序、加工的优质信息源，更容易导致信息贫困。

第三，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人群在“信息源视野”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表现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不同职业在“信息源视野”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表明，职业变量对信息贫富分化的解释能力有限。

本研究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对意义建构及情境因素影响下的信息贫富分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了一些理论认识。这些认识的取得，有望为信息贫富分化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但囿于各种条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一些局限。①本研究样本并非随机抽取，定量研究部分所得到的结论很难推衍到更大的群体。而且，本研究所展开的定量分析仅仅揭示了相关关系，对于“信息源视野”与信息贫富分化之间因果关系的揭示，尚需后续研究的跟进。②本研究虽然基于访谈，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视角对信息贫富分化做出了整体性解释，但这种分析仅仅局限于探索性定性分析阶段，对于“信息源视野”内重要程度不同的信息源之于信息贫富分化影响的揭示也需要后续研究的跟进。③本研究的基本立场是，信息贫富分化的研究不仅应立足于客观信息环境的分析，也要

关注信息主体的意义建构等主观活动。然而, 建构主义学说本身尚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很多处于争论中的理论命题和逻辑将不可避免地对本研究的效度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 [1] Chatman E A. Framing social life in theory and research[J].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2000(1): 3-17.
- [2] Chatman E A, Pendleton V M. Knowledge gaps, information-seeking and the poor[J]. *Reference Library*, 1995, 49/50(23): 135-145.
- [3]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A & NTIA).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toward digital inclusion[EB/OL]. [2014-11-25]. <http://www.ntia.doc.gov/report/2000/falling-through-net-toward-digital-inclusion>.
- [4] OECD/DSTI.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OECD papers[EB/OL]. [2011-11-01]. <http://www.oecd.org/dataoecd/38/57/1888451.pdf>.
- [5] Yan H, Zhou W, Han S. How does a gloc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project overcome digital inequalities? The case of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Gansu province[J]. *Library Trends*, 2013, 62(1): 234-260.
- [6]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与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1): 4-11. (Yu Liangzhi.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he discovery and exposition of a concept for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 39(1): 4-11.)
- [7] Schutz A, Luckmann T.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M].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59-85.
- [8] Schutz A.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22-29.
- [9] Sonnenwald 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f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ur: contexts, situ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horizons[C]//Wilson T D, Allen D. Exploring the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Needs, Seeking and Use in Different Contexts. London: Taylor Graham, 1999: 176-190.
- [10] Sonnenwald D, Wildemuth B. A research method using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horizons: an example from a study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udent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J].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2001(2): 65-86.
- [11] Savolainen R.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s and source pre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07, 58(12): 1709-1719.
- [12] Savolainen R, Kari J. Placing the Internet in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s: a stud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y Internet users in the context of self-develop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4, 26(4): 415-433.
- [13] Agosto D, Hughes-Hassell S. Toward a model of the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needs of urban teenagers, part 1: theoretical model[J].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10): 1394-1403.
- [14] Savolainen R. Spatial factors as contextual qualifiers of information seeking[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06, 11(4): 3-13.
- [15] Yu L.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10): 1-16.
- [16] DiMaggio P, Hargittai E, Celeste C, et al. Digital inequality: 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M]//

Neckerman K.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355-400.

- [17] Losh S. Gender,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digital gaps[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4, 22(2): 152-166.
- [18] McLaren J, Zappala 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n Australia[J]. First Monday, 2002, 7(11):1-8.
- [19] Ebo B. Cyber ghetto or cyber topia? Race, class, and gender on the Internet[M]. Westport, CT: Praeger, 1998: 24-85.
- [20] Cornfield M, Rainie L. Online campaigners, citizens, and portals in the 2002 elections; Institute for Politics, Democracy & the Internet[M]. Washington DC: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03:53-67.
- [21] 于良芝, 刘亚. 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36(1): 4-19. (Yu Liangzhi, Liu Ya. Structure and agency: th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rehensive stud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36(1):4-11.)
- [22] Dervin B. Users as research inventions; how research categories perpetuate inequiti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9, 39(3): 216-232.
- [23] 刘亚. 教育对青少年信息贫困的影响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2. (Liu Ya.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teenagers' information poverty[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 [24] Johnson J. On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seeking[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03, 39:735-760.
- [25] Talja S, Keso H, Pietiläinen T. The production of ‘context’ in information seeking research: a metatheoretical view[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1999, 35(6):751-763.
- [26] Kari J, Savolainen R.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context: a qualitative study of Internet searching and the goal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7, 29(1): 47-69.
- [27] Chang S, Lee Y. Conceptualizing contex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in dissertation research process[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0, 26(2):4-18.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967号。邮编:730030。

闫 慧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邮编:300071。

韩圣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邮编:100871。

(收稿日期:2014-06-03;修回日期:2014-07-20)